

《斗争》中蕴含的精神密码

深阅读

目光回望

《斗争》杂志为原中共中央机关刊物,直接由张闻天任书记的中央党报委员会领导。该刊物主要发布共产国际、中共中央、苏区中央局的决议、指示,同时刊登各级领导同志和实际工作者的理论文章、调查报告、工作总结等,出版期间先后发表党的文献和署名文章300多篇,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刘少奇等同志均多次在该刊发表文章。《斗争》杂志是党中央指导苏区斗争的综合性刊物,对于加强党在思想、理论方面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,对苏区革命和建设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。

在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报刊史上,《斗争》杂志曾经有过3个版本。一是“上海版”《斗争》。1932年1月21日在上海创刊,系油印的不定期刊,曾由张闻天主编;中共中央机关迁离上海后,该刊仍在上海出版,内容以中共中央文件、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文章为主,1935年7月5日停刊,共出版79期。二是“苏区版”《斗争》。1933年2月4日在江西瑞金印刷发行,系铅印的旬刊,16开本,1934年9月30日休刊,共出版73期。三是“西北版”《斗争》。红军抵达陕北后,1935年11月21日,《斗争》接续“苏区版”期号在延安印行,作为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刊物,后改成中共中央机关刊物,系周刊,32开本,共出版54期,1937年3月19日终刊。

内容撷珍

在今年“五一”节中,日本帝国主义不仅占领满洲,热河,而且在国民党步步出卖投降面前,已经进据万里长城的各个要口,正在长驱猛进向着华北继续进攻。中国几千万劳苦群众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,已经完全变成了殖民地的奴隶,几十万里的领土,已经完全被国民党出卖了。国民党对于义勇军和抗日士兵,不发一弹一枪,却调集数十师兵力,向真正抗日的苏



《斗争》,1933年2月4日创刊于江西瑞金。



1933年4月5日,《斗争》发表题为《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而奋斗》的文章。

维埃和红军作大举进攻,来充分尽他那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清道夫的角色使命。在今年的“五一”纪念中,我们必须广大的(地)传播最近党中央委员会的宣言,团结全中国的反帝群众和士兵在我们的周围,猛烈扩大民族革命战争,打倒出卖民族利益的国民党,打倒屠杀中国民众的日本与一切帝国主义。

——《今年的五一劳动节》,作者:

然之,刊于《斗争》1933年5月1日第十期。

为着战争胜利的发展,就必须使党的主张和策略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,就必须坚决的(地)向一切反革命派别进攻,要把一切反革命派别的组织与思想,完全从革命队伍中肃清出去,不使敌人的改良欺骗或斯宣传来动摇革命的队伍,要坚决肃清革命队伍中动摇异己的成份(分),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,使反革命的思想与活动,无法侵入到革命队伍中来。

为着要胜利的扩大民族革命战争,发展苏维埃区域,就必须以一切力量,在白色区域与白军中组织革命的进攻,建立白区白军中党的影响与组织,组织工农白军士兵群众起来进行反对地主、资产阶级、帝国主义、国民党军阀的群众的武装的斗争,以配合工农群众与红军胜利的进攻。

——《什么是进攻路线》,作者:任弼时,刊于《斗争》1933年2月22日第三期。

在一九三一年宁暴以前,博生同志在与其他同志谈话中常说:“我们所住的,所穿的全是工人作(做)成的,我们所吃的全是农人费了无限的血汗耕种而得的。离开了工农劳苦群众,我们是一时一刻也不能生存的。时机一到,我们为了工农劳苦群众的利益,并为我们自身的解放起见,即拼命流血,牺牲,亦所不辞。”因努力革命宣传与刻苦耐劳工作的结果,博生同志使二十六路军的士兵群众深刻的革命化,使自己成为革命士兵群众所爱戴的领袖。不久,博生同志即领导了二十六路军的革命士兵,举行了光荣的宁都暴动,竖起了辉煌的苏维埃的红旗。

——《追悼博生同志》,作者:亮平,刊于《斗争》1933年2月4日第一期。

(以上内容由编者辑录)

掩卷之思

从《斗争》感悟斗争精神

■刘成蔚

在灯光下翻开这本由中国发展出版社整理出版的《斗争》杂志,指尖触到的不只是纸页间留下的岁月温度与

质感,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脉搏。作为我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有力的宣传阵地,《斗争》既是历史的见证者,也为今天我们发扬斗争精神提供了重要启示。

在绝境中坚守真理的信仰之光。《斗争》的编辑史本身就是一部血与火的传奇。张闻天在上海租界阁楼里躲避特务追捕时,曾将排版好的铅字藏入煤堆。杨尚昆在瑞金的山洞里,借着马灯微光完成排版。这种“敌人枪炮声中办刊物”的韧劲,是宣传战线发扬斗争精神的生动体现。

从田埂调查到理论创新。毛泽东同志执笔的《上杭才溪乡的苏维埃工作》发表在《斗争》第45期。这篇文章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毛泽东同志没有简单转述马克思主义经典,而是深入赣南田间地头,发现才溪乡绝大多数青壮年都参加了红军,出现了劳动力锐减、“耕田主要依靠于女子”的情况。为解决劳动力的不足,当地群众才创造了“劳动力互相调剂”的劳动合作社与耕田队。文章称赞“现在全苏区实行的‘劳动互助社’,就是发源于此”。

让真理飞入寻常百姓家的传播智慧。《斗争》通过“墙报连环画”和“朗读队”,将党的理论传入识字率不足20%的苏区。那些印着灯笼和镰刀的木刻板画,那些用方言传唱的政策歌谣,让真理突破了知识与认知的壁垒,达到很好的传播效果。这种“沾泥土带露珠”的传播方式,正是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需要传承的基因。当前,从“指尖课堂”,到基层宣讲员的“板凳会”,我们依然在延续这种让理论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的红色传统。

在斗争中凝聚民族复兴的强大力量。《斗争》多次报道前线战况、红军英勇事迹以及“扩红”突击进展等,鼓舞苏区青年积极参军参战。《斗争》在凝心聚力、激励青年成长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。这也提醒我们:只有引导广大青年将个人理想融入民族复兴伟业,才能更加广泛地凝聚起奋斗的力量。

合上这本带着硝烟气息的刊物,我仿佛听见历史与现实的深情对话。《斗争》凝结着共产党人斗争精神的密码。它启示我们,无论时代如何变迁,只要心中有信仰,脚下有力量,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,就没有达不到的目标。

仅在于积累知识,还在于于适用现实、付诸行动。

陆游读书也不只是为了自己。他“读书本意在元元”,明确表示自己求学的目的是为了天下百姓。从少年时的“上马击狂胡,下马草军书”,到暮年时的“位卑未敢忘忧国”,他的阅读生涯始终与民族的兴衰紧密相连。这种将个人修养与国家命运相结合的精神,是中华读书人的优良传统。在当今时代,面对浩瀚如海的信息洪流,我们更需要具备这种宏大的视野:阅读书籍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成长,更是为了推动社会的持续进步。

陆游已经离开800余年了,每当我翻开书页,仿佛还能看见那个在青灯下奋笔疾书的身影,听见那个在风雨中诵读经典的声音。在第30个“世界读书日”来临之际,期望更多战友从陆游的读书生活中受到启发,不断通过读书来完善和超越自我,更好地为部队建设贡献力量。

《昆仑约定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)一书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高原戍边生活为背景,通过郭换金、景自连、麦青青等一个个鲜活人物,讲述了一群年轻边防战士在气候恶劣、物资匮乏、医疗条件简陋等极端环境下淬炼生命、追寻理想的故事,展现了一段波澜壮阔而又充满艰辛的岁月。

(管鹏赫整理)

版式设计:张世世

作品评论

《喧嚣的墓地》是红安籍军旅作家李骏的长篇新作,也是其故乡红安系列作品的新篇章。湖北黄安(今红安),是一方红色的土地——大革命时期,这里打响了黄麻起义第一枪,诞生了红四方面军。

作品以红安这片浸染了革命的血与火的土地为背景,以李姓和吴姓两大家族为主体,书写了两个家族的百年变迁史。

创作中,作者以双重身份介入乡土书写。一方面,他是红安革命历史的“寻根者”,努力打捞被宏大叙事遗忘的小人物命运;另一方面,他是生活在现代军营的观察者,在历史与现实的交错中思考故乡革命史的当代意义。

小说中,信仰的转变成为推动情节发展与人物命运走向的关键力量,亦是时代浪潮对传统乡村社会深刻冲击的生动写照。作者以本吴庄作为背景,折射人们在思想觉醒与信仰升华中走向进步的过程,体现了作者对红安革命根源的深入思考,使作品在家族史的书写之上增加了文化厚度与思想深度。

李骏曾言自己创作红安系列作品的初衷:“聚焦小人物,或革命途中离散者,或默默耕耘乡土者,以个体命运波折诠释革命复杂性与民间疾苦,为红安历史注入鲜活灵魂,唤醒沉睡记忆,令乡土成为永不落幕的精神原乡。”

在《喧嚣的墓地》中,无论是李氏家族的族长李非凡,还是吴氏家族族长吴上人,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豪杰,而是在历史洪流中挣扎求生的平凡人物。这些小人物有着各自的欲望、挣扎和无奈。他们的命运在时代的大背景下交织碰撞,构成了一幅生动的社会画卷。

为了生存,两大家族的人们陷入无尽的纷争,有人因此家破人亡,有人则在争斗中迷失自我。然而,即使身处困境,他们依然展现出人性的光辉。有的村民在面对生活的苦难时坚韧不拔,有的在大是大非面前坚守正义。李骏通过对这些小人物细致入微的刻画,让读者看到了历史的复杂性和人性的多面性。在他的笔下,人物的故事不仅是个体的命运之歌,更是那个时代无数普通人的共同写照,使读者能够深切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生命的坚韧。

值得关注的是,“墓地”作为书名的关键词之一,在书中不仅是物理空间,也是承载文化记忆的精神场域——墓地虽然属于逝去的人,但通过一系列血缘宗亲关系、习俗观念、文化仪式等,连接起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,蕴含着跨越生死血缘关系、道德伦理、精神情感、习俗观念乃至恩怨情仇。

因此,作者通过“墓地”这一意象,完成了对乡土中国的多重隐喻。

可以说,《喧嚣的墓地》不仅通过100多年的故乡家族变迁史展现出乡土文化的变迁,而且通过对革命文化的朴实书写,使得书中的乡土叙事超越了红安地域的局限,呈现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民族特征。

在小说的结尾,墓地因城镇化发展

红色乡土的信仰叙事

■袁 念



面临拆迁,乡土记忆逐渐消散。李骏作为作者现身于小说世界中,以李氏后人的迷茫与挣扎,提出了尖锐的诘问:乡村的精神根基何在?

当传统乡土生活方式逐渐远去,乡土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将怎样传承?李骏在小说中传达出的忧虑和思考,将他从乡土的个体化叙事,推向了对于乡土文化命运的关切。这也反映出乡土文学、革命文学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紧密关系。

对乡土的民族文化意义和革命历史意义的再发现,不能置身于现代化进程之外,我们应该思考:新时代军旅文学的叙事,如何让传统的乡土和作为现代化起点的革命,在当下成为新的叙事风景?期待军旅作家们继续开拓新时代乡土叙事与军旅叙事的新篇章。

读书生活

“死去元知万事空,但悲不见九州同。王师北定中原日,家祭无忘告乃翁。”这首《示儿》,是我背诵的第一首陆游的诗作。尽管当时年少的我对家国情怀的理解尚浅,但诗中所蕴含的那份深沉情感却打动了。后来,我逐渐明白,陆游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,更是一位真正的学者。他的读书方式,给我很多启示。

在陆游的世界里,阅读并非一项

任务,而是与生俱来的本能。它不是一种负担,而是一种愉悦的享受。他在63岁那年写下:“退食淡无味,一窗宽有余。重寻总角梦,却对短檠书。”到了75岁,他依然坚持“夜窗风雷一灯青”。甚至到了84岁高龄,他仍旧“读书至夜分”。这种对知识的渴望,不因年岁的增长而有所减弱,也不因视力的衰退而选择放弃。反观我们现今的状况,许多人的阅读经常被手机的提示音所打断,被社交软件所分割,被功利性的目的所驱使。陆游对于读书的执着,向我们发出提醒:真正的阅读需要全神贯注,需要心无杂

念,以至把阅读当作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
陆游读书,不局限于书斋中的学习研究。他深知“纸上得来终觉浅,绝知此事要躬行”的真谛,总是努力将书本知识转化为生活的实践。阅读兵法书籍,他思考的是如何收复失地;研读医学著作,他探索的是如何救治病患;翻阅农业书籍,他关心的是如何改善农民生活。这种将知识与行动融为一体的读书方法,在当下显得尤为宝贵。在我们被各种“干货”“速成”信息所环绕时,陆游启示我们:读书的目的的不

新书架



《初心初样当年时》(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)一书共设7个篇章,对毛泽东、周恩来、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勇担使命、甘于奉献的形象进行细致刻画。本书内容丰富、娓娓道来,通过大量生动史料展现了英勇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在逆境中奋起,带领着中国人民取得伟大成就的光辉历史。



《昆仑约定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)一书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高原戍边生活为背景,通过郭换金、景自连、麦青青等一个个鲜活人物,讲述了一群年轻边防战士在气候恶劣、物资匮乏、医疗条件简陋等极端环境下淬炼生命、追寻理想的故事,展现了一段波澜壮阔而又充满艰辛的岁月。

(管鹏赫整理)



长征

第6431期